

青年与社会变迁

[美]理查德·弗拉克斯 著

李 青 何非鲁 译

*

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西裱糊胡同)

新华书店总店科技发行所经销

北京日报印刷厂排版

河北省香河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4.5 印张 97 千字

1989 年 4 月第一版 1989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502-255-0/G121 定价:1.90元

《二十世纪世界青年》丛书编委会：

顾问： 雷洁琼 袁 方 陈元辉
徐怀中 林毅夫 陈一咨
[日]千石保 [美]沃格尔
[美]骆思典
[西德]霍恩斯坦因

主编： 李国庆

编委： 王汉生 王润生 白南生
田 阔 孙立平 李庆善
肖东升 杨象峰 金向东
单光耀 胡敬署 柳斌杰
郭 琰 焦光国 焦勇夫
鲍晓媛 额尔敦

原著序言

这是由我们两人主编、马克哈姆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美国社会的进程与变迁》丛书中的一本。理查德·弗拉克斯在本书中清晰地描述了美国高等院校学生运动50年代至60年代的衍变脉络——美国大学青年们怎样把宁静的校园变成富有战斗激情的场所；怎样把抗议和政党活动引进校园，又怎样把对现状的不满转化成冲出大学院墙外的社会行动和社会实验。在我们看来，弗拉克斯教授的观点带有鲜明的党派性，他对青年运动的剖析，虽然表明他是与激进的青年运动站在同一条战线，但这丝毫不能说他的观点是盲目的；相反，他的剖析恰恰证明他的观点是建筑在对运动的全过程进行认真研究的基础之上。也正因为我们不能象弗拉克斯教授那样醉心于青年运动，因此我们不可能深切了解在60年代政治及社会发展中的青年，特别是出身于中产阶级的大学青年所扮演的角色。

60年代，在大学里兴起的激进青年运动的前途，还是一个未知数。学院里的吵闹之声，是少数学生发出来的，大多数的年轻人还是避开了行动主义，依旧静静地为将来所要从事的传统祖业而准备。数以千计的年轻人在中学毕业后就进入了劳动力市场并已成家立业，他们根本没有在大学这一舞台上出现过。显然，就大多数青年而言，在生命的历程中，他们很早就开始过着父辈一样的生活，他们无疑是和象父辈一样反对

根本的社会变迁的。即使其中有些年轻人是很偏激的，但一旦离开校门进入社会后，他们也很有可能象老年那样变得保守。但是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就此断言60年代的激进青年运动是没有前途的，那就未免失之公允。正象弗拉克斯教授在本书的结论中所说的那样，激进青年运动是能够从某些人所断言的若干可能的途径中超越出来，并深深地影响着美国社会的未来进程。今天看来，60年代的大学青年运动，确实已替我们的社会开辟了不少新的生活途径。至少，一个年轻的专业人员能够自由选择终身服务于他人的途径了，这在十年前是没有的。此外，两性关系也开放了，认为金钱消耗了个人的道德价值，这一观念也已大大衰减。

虽然激进青年不是到处都受欢迎的，因为这些青年看待社会并不客观，他们往往看不到最好的东西，并且也不能一针见血地指出最坏的。可是，一些醉心治学，醉心于知识自由的知名学者们，把激进青年们对社会的质询及抗议说成是法西斯主义和精神病，这是很可怕的看法。

我们必须指出，大学里青年们偏激的高调往往是空无一物的，而不是一针见血的。这或许应归咎于高等教育的失败，而不是喊高调的学生们的过失。认为大学里的青年运动干扰了他人在既存体系下工作学习，必须加以清除；这种说法当然有其正确的一面，但是我们也须注意到，一些人的权利是可以从调适其他人的自由中挽回的。

我们虽然没有象弗拉克斯教授那样醉心和同情激进青年运动，但我们的确感到这场运动已把我们这个社会的显著问题提出来了。同时，学院里行政首脑们的烦恼，最终必然归咎于高等教育的组织及其在社会里的位置，而不是归因于少数

叛离青年们的幻想和堕落上。以世风日下来解释青年运动，只不过是替压抑在道德教条下的人说话罢了；只有以既存制度的弊端来解释青年运动，才蕴含着向一个好社会迈进的承诺。激进的学生们往往较他们的长辈们更清楚这个道理。这些长辈们甚至不大愿意去了解大学及其他制度必须适应这个社会，否则就会失去其存在意义这一事实。

在编写这套丛书时，我们建议作者们尽量利用系统的文献及数字资料。我们也曾建议他们运用其他的资料以补充数字资料的不足。或许更重要的是我们建议作者们以挑战性的笔法来写，并且要求把那些统计及文献资料的片段用一种理论观点、一个主题或以理性原则为基础的批判观点贯穿起来。理查德·弗拉克斯对那些已经感染了很多而又可能影响我们将来生活的事件所作的估价及批判，确已达到了我们的要求。

比尔·霍德吉 密执根大学
大卫·斯垂特 纽约州立大学

1971年11月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1)
第二章	青年的概念	(8)
	——各种社会中不同的观点(8)	
第三章	在困惑中成长的一代	(18)
	——与父母亲的价值冲突及困惑(23)	
	母亲的困境(25)	
	父亲的困境(26)	
	社会变迁的步调(28)	
第四章	变迁的意外结果	(33)
	——青年亚文化的形成(33)	
第五章	青年的反文化运动	(44)
	——青年文化的“功能”(45)	
	“知识分子”型青年文化的扩散(56)	
	新音乐(57)	
	发型及服装的新款式(62)	
	药物(63)	
	学生激进行动主义的兴起(68)	
	第一阶段：和平主义、抗议及改革(71)	
	第二阶段：对立、偏激化、反抗(77)	

	第三阶段：学生抗议之外(84)	
第六章	70年代的一些可能动向	(96)
	——新意识向非学生青年扩展(99)	
	青年文化的区域化(101)	
	“受教育劳工”的偏激化(105)	
	妇女解放及两性角色反叛(108)	
	回到政治上去吗?(111)	
	为什么要革命(121)	
	青年团结的瓦解(124)	

第一章 导 言

有关“青年”的书籍及文章，真可谓无日不有。只要报刊编辑、社会科学家及其他的人认为青年的行为有描述、分析、辩护、攻击的必要，一般人也就有阅读这类文章的必要了。我想，人们之所以这样热衷于对青年的行为寻求解释，是由于青年们正以各种方式在攻击并背弃美国的主流文化、政治及社会的规范和原则；而这些行动竟又发生在物质充裕，个人有充分发展机会的时代。许多美国人都了解反叛是什么——特别是发生在其他地方，其他年代的反叛——但他们通常只把反叛解释为对饥饿、暴政、及不平等的反应而已。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反叛行为竟发生在丰衣足食、经济前途光明、生活奢华、有着太多自由的美国青年之中，尤其是出身于白人中产阶级的青年；表面看来，这的确是不可理解的。然而，某些新的事件正在蕴酿着，一个源流不明的运动正威胁着现有生活方式。正因它是如此的不可理解，所以我们必须对它寻求解释。

你也许不想再阅读有关青年的书籍了，你或许还与我有同感：大多数有关青年的报道与解释都是极不准确、极不完整的；也许你和我都相信：目前发生在青年中的各种问题已经够明显、够深刻、够复杂了，它们迫使我们必须不断地整理、修改、更新我们对此的解释。所以在此，我能做的仅是：对本书所探讨的事物作一番评述，并且阐释书中我所持有的独特见解。

就50年代的大学生而言,我当时算是“越轨”的人了,因为我属于那种政治的积极参与类型。作为一个大学校园内的青年民主党主席,我曾参加过支持民权法案的请愿游行;开过不少会议,散发过不少传单。在我们校内上万的学生中,约有50人在政治上是很活跃的,这些人包括所有的青年民主党党员、青年共和党党员、青年社会主义党党员、美国青年民主行动党党员、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学生会员,及学生中的政府活动参与者。每当我们游说学生们为民权请愿签名时,通常的反应是敬而远之。不少人回答道:“签上了名或参加了某些团体可能会对我将来谋求公职形成障碍。”总之,那是一个对政治普遍冷漠的时代;那种害怕表露了自己的观点会引来麻烦而产生的政治冷漠感,弥漫了整个50年代。这种态度是根植于对麦卡锡主义,即在经济萧条的30年代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把那些被视为极端分子及改革分子的人列上黑名单,并对他们采取残酷侦辑行动的恐惧。

我记得,在50年代,学生们不仅普遍对政治冷漠,而且还实行崇尚“温文尔雅”之风。这几乎贯穿了他们的整个生活。所谓的“温文尔雅”,就是表现得“像个学生”——短短的头发、东部名牌大学的深灰色制服、齐膝的短裤,及圆圆的别针。而在政治冷漠感和温文尔雅背后,则弥漫着一股每人都向往达到的气氛——躲进一个安稳的、与世无争的、能与之相依为命的世外桃源似的田园小镇里。

然而,我们当中有小部分人却是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这也就是说,就对事物的关心而言,我们是不流俗的。我们关心社会,关心艺术,关心书本,关心思想。但我们却与一般人不一样,有着强烈的愤世嫉俗心理。在我们看来,将来的日子不会

与50年代有什么区别，我们那时所能期望的仅是一种在心灵上较充实、较有意义、较有规范的生活方式而已。对我及我的大多数朋友而言，学术生涯能使我们从事合乎自己志趣的工作，接触合乎自己志趣的人物，与志同道合者交换意见，并可免除钟表强加于我们的时间枷锁。因此，我决定进研究所，作一个社会科学家。

1960年初，至少在我的研究所的所在地——安娜堡(Ann Arbor)，校园内有了些新变化。主动表示支持南部民权运动的学生愈来愈多了，温文尔雅及墨守成规的风气已逐渐被那与日俱增、难以遏止的政治辩论取代了。越来越多的学生由于对讽喻社会的民谣、政治态度严谨的影片及其他文化活动有着共同的兴趣而聚合在一起，他们还尝试着过波希米亚(bohemian)似的豪放不羁的生活和穿宽松简便的服装。

1962年，我发现安娜堡的一些学生开始严肃地策划一项全国性的基本社会变迁运动。他们正筹备着一个名叫“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的组织，同时正拟订着严谨的计划，以推动学生们参与民权运动、反核试验，及反军备竞赛。在我看来，“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的产生正意味着时代的转变——麦卡锡主义已经死亡了，大学校园内的政治冷漠及顺从，正遭受实践与反抗的新精神的挑战。于是，我全心全意地加入“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参与了该会全国性机构的奠基工作，稍后又当选为全国性的执行委员。从此，我便从一个厌世的“明哲保身主义者”，转而成为一个年青的“新激进分子”了。

自此之后，我一直都是个政治性运动的活跃分子——我担任了几年“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的干事，其后又作反战的

工作，也支持过学生的若干示威运动，并且作过不知多少次的演说。读者在读我的这本书时，请勿忘记我曾是个学生运动的直接参与者，我的切身经验使我能够获得有关运动的参与者以及活动情况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是其他研究者难以获得的。我的切身经验使我认为，青年的反叛是积极的，在历史上是具有决定作用的，对社会是必要的。

在这几年中，我变成了一个社会学家。换句话说，除了参与政党外，我也参与专业人员的圈子——以促进我对社会现象的了解，及将我的了解和解释献给别人。60年代学生运动的兴起，激起我对社会现象的好奇和对人类的忠诚。譬如说，为何大学校园内的气氛从50年代到60年代有着这么显著的变化？“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又是何人所发起的？究竟哪些是青年认为的将放荡与严肃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的“抒情诗人”？为何那些丰衣足食的时代宠儿，竟会把自己投进争取种族平等、反战争及反兵役的漩涡里？为何那些抒情诗人和行动家同时获得愈来愈多的青年们的支持与信任？这些都是社会学所探讨的核心问题，它们引发出社会学家们近年来谈论到的一系列问题。事实上，以往的社会学家们不仅不能预测出60年代的群众运动，并且，他们的观点还否定了这种运动，会在一个象美国这样“稳定”、“民主”、“多元”、“富足”的社会里发生。

所以，近七年来我一直都埋头于从社会学的观点，去研究分析学生的反叛及青年文化。60年代中期，我和一群研究者在芝加哥大学（后来我在那里执教），进行一项对新左派行动人物的社会背景的初步研究；对50个行动人物及其父母，和一群非行动人物及其父母作深入访问。自那时起，我收集了各种有关行动人物的社会背景及个人观点的调查资料。同时，在这些

岁月里，我曾尝试作一个参与观察者——我一面做有关运动及反文化的各种组织及群体的正式成员，一面又尝试从旁观者的角度去收集及记录我的印象和经历。在这本书，里我将把我获得的“资料”摘要反映出来。

无疑地，学术专业的角度和党派的角度，是有着某种差异的。致力于党派者，其目标在于努力争取更有价值的社会；致力于专业学术者，其目标则为献身于用客观方法来寻求真理，而不理会其结果。

我不准备对上述的差异多作评论，但我却认定党派与学术专业是相辅相成的。一生同时致力于党派、专业的工作者，可能把事情看得更深入、更仔细，并且可能较置身于政治性事务之外的专业人员，对某一范围内的经验更敏感。再者，政治冷漠的立足点，也可能是忠于现状的无意的（或有意的）伪装。但是，从另一方面，我觉得专业人员的理性、客观、及实事求是的立足点最终是基于含有人道主义目标的具有政治意义的社会运动之上的，这样又是不可能对政治持冷漠态度的。这两种立足点的混合正是我在此要试行的。但读者也得注意到这种混合有失败的情况。例如：我的解释似乎带有主观的色彩，而且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事物；但另一方面，你也得注意到理性、客观的论调，如何遗漏了强烈的情感、丰富的经历以及所描述的事情的潜在、隐匿部分。

那么，这本论著的目的是什么呢？首先，它假设了近十年来学生运动及青年反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e)有实质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在美国社会中又是新生事物。它之所以是新生事物，是因为在美国历史中找不到一个在大学校园内发展得如此深刻广泛的激进运动，也找不到这种如此多的年轻人把

自己置于反抗固有文化的前列的事情。虽然激进主义在美国已有很长久的历史了(尽管很少形成如此激烈的革命口号与行动),但没有一个运动是由青年所发起并受青年如此重视的。学生的激进主义是有史可查的,一般也不与成年人的组织或党派有关连,即使就是为后者所发起也如此;在美国还有青年的放荡主义的历史背景,但它也只出现于少数的青年群体中。

我们必须记住,学生运动及代际间的冲突,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一直都是普遍的现象。但在60年代以前,这些运动一直都被视为是在现代化压力下,低度开发、农业本位主义和极权的社会特征——如俄国、中国、拉丁美洲及19世纪的德国——这些运动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失调的情况下,在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发生的。

本文的基本理论观点是:青年的反叛是社会文化转变的基本征候。概言之,这种转变表示了正在崛起的科技潜力与现存社会秩序和文化体系之间的基本冲突。要想使科技能力得以发挥,就必须建立新的价值、新的动力机制、新的权利和新的制度。科技变迁产生了新的社会角色——新的阶层——其成员心里怀着对旧规范及固有结构的不满情绪,社会中的规范及文化也就透过无数人所作的无数努力逐渐演化,由于不断去适应新问题、采纳新方法、实现新愿望而向前迈进。这种转变过程将是缓慢而绵延不断的,因为既存的政治体系及权威结构总是要抗拒这种根本性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会有愈来愈多的青年认为文化是不协调的,将来是不如意的、混乱的。年轻人最先有这样的感受,因为他们企望在生活中很快建立稳定的职业及社会关系,因为他们最直接地、全面地经受着

既存制度的督导。在此情况下，许多青年便把这种文化转变视为“认同的危机”(crisis of identity)，即，无法界定生命的意义，无法接受兄长所指导的成年人应有的角色含义及规范。

然而，认同危机和不满仍不足以解释青年群体的反叛。社会运动及亚文化(subcultures)必须在不满的人群能够互相影响及采取共同行动的条件下才能形成。因此，我认为形成青年们眼中的危机的各种因素，必须也同时会形成他们相聚一堂的环境。不满与相聚是两种不同的过程，故对于发生在青年群体中的事情的了解，不能单独着眼于不满，或单独着眼于互相影响。

群体运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为何只有其支持者中的一部分人活跃地参与行动？另外，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运动中的行动家主要是这一运动所涉及的复杂人群中少数几个特殊、孤立的个人，60年代的青年运动尤其如此。对于近十年来的各种运动的任何一个解释，主要都在于阐述这些运动为何总是由这样固定类型的青年——他们在社会背景、价值取向、志趣及期待诸方面，都有别于大多数青年——所发起呢？同时，我们看到这些运动都能扩散到其他类型的青年群中去，那么这群“叛离”分子又为何影响了那些起初是保守与敌对的大众呢？

最后，我们对未来能否下一些断语呢？我们能否从运动与既存权威和制度间的互动，来描绘出未来十年的可能趋势？假设这种趋势能描绘出来，我们能否借此寻觅出一些提示，使我们能把未来塑造成与我们所梦想的一样呢？

很多读者对本书所论及的事物比我知道得更多(虽然他们不一定是倍受推崇的“专家”)，我愿以喜悦的心情聆听他们的反应——即使是尖刻的抨击也十分乐意。

第二章 青年的概念

各种不同社会中的观点

凡是生物都有青春年少之时。在人类社会，当然也少不了青年这一角色。在生物学意义上，没有必要强调年轻人在青春期后的几年中，仍须继续与成人分别看待：不准担任成人在性、经济、社会上的角色。最迟到18岁，每一个人在事实上都已成为成人了——性机能已成熟，体能和智能也已都达到高峰。所以在很多文化里，年轻人没有被分隔出来单独归类。把青年从成人和儿童之间划分出来，这在西方文明中还是最近几十年来的事。童年史学家菲利普·亚雷斯(Philip Aries)曾如此记述过：

在中世纪以及近代开始以后，低层阶级的儿童，一旦能脱离母亲或奶妈而独立行动(即约7岁时)，便与成人混在一起了。他们马上便闯进成人生活圈子里，与成人共享工作与娱乐，老少不分。……儿童在断乳后很快便成为成人同伴。

就年龄而论，最恰当的说法似乎是：13岁是童年的结束，13至16岁该是青春期，青年就是超过16岁但仍未进入劳动力

市场谋生的人。儿童不宜参与成人生活，而须通过一段时期的分隔与训练——虽然这种观念在我们的文化里的影响，差不多已经延续了两个世纪之久，但只是在近五十年来，强迫教育与暂免劳动的原则才普及于各阶层的儿童们。

需对青春期的年轻人进行限制这一观念，其产生的年代更晚。1900年，在150万名17岁的人中，仅有10万人完成中学教育，至1940年，完成12年教育的青年增至50%。直至前十年内才超过66%。这些数字表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青年还没有与成人分隔开来。在那时期以前，大多数16岁以上的人都被视作成人或专业劳动者。因此，我们把“青年”定义为青春期后仍未正式加入劳动力市场的人。这在近十年前，我们的社会里大多数人可能都没有经历过这样一段时光。

今天，在16至21岁的人中，涉足于劳动力市场者不到半数。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事情。大部分的人在学校中，一部分人在军队里，有一些人失业、半就业或游荡街头。在20至24岁的人中，25——这也是前所未有的数字——仍在学校中。近十年来，25岁以下的人从成人的圈子里给划分开来，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重要的社会变迁之一。虽然整个历史都有着“青年”，但就我们所知，从未出现过如此众多的“青年”人口。

正因为介于儿童期与成年期之间的青春期，是学校正规教育的副产品，所以，其发展是有目的的。正规教育是一种社会需求，因为家庭本身已不足以为儿童作好承担成人角色的准备了。当一个社会经济体系包含着需要高度专业技术的角色，而且这些角色又需要通过竞争才能获得时，父母及亲戚就得退位，让教师们来教导儿童，使他们有能力扮演成人的角色。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在校青年人的比例及他们在校的时

间也与日俱增,因为这种社会要求它的成员具有前所未有的适应能力及流动性。新的职业及工作正在不断地诞生,过去那种寻求职业的途径也正在不断地被摒弃。全面的文化熏陶、文字教育、专业训练及成就竞争等需求,正平稳而普遍地在社会中展开。

历史上,当年轻人在生理上达到成熟时,便须加入成人的行动行列。传统上,在世界各地都是只有优越阶层的后代(加上少许非优越阶层出身但看来很适于作优越分子的青年),才会在到达生理上的成熟时仍继续与成人分离并对其实施教育。于是,作为一段生命历程来看,青年教育便被视作只为那些对既存文化有治理的天职,或被挑选出来作治理者的人而设置的必要而理想的措施了。因而,这种教育也就不仅被视作是青年获得智育的必经之途,同时也被视作是培养优越阶层气质的阳关大道了。

这样一来,当社会日渐变得更复杂、更工业化、更科层制化时,年轻人与成人的分隔与单独归类出来,也就变成社会演化过程中专门设立的、固定不变的一个方面,并被称为社会“进步”的要素;同时,那些已拥有权势的人,大多也会希望他们的后代变成这种意义下的“青年”,并且把这种附加的前成人阶段视为至宝,以保存或扩展他们家族的声威。

然而,对那些享有教育的优越阶层来说,中学教育的发展也有某些戏剧化的意外结果。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那些正在受着教育的青年常联合起来与优越分子及既存的社会秩序对抗。概略地说,学生们集体对抗既存的社会秩序,有其传统的渊源。落后社会(在此,我所指的落后社会的含义:包括19世纪的德国、俄国、东欧、中国及其它亚洲国家,以及拉丁美洲的